

墨走集

■ 主编 / 周斌 李安东

MOZOU
JI



中华民族是一个
极为安土重迁的民族
只有更多的泥土才能使中国人的
灵魂得以安宁
中华民族又是一个不安于现状，
时时刻刻都向往着
走出去的民族
地球的第一个村落

都有用生命的代价
去换取另一种活法的

中国人，

凡是有海水的地方
就有中国人。

■ 著 / 李安东

吉林文史出版社

● 文学放谈丛书

墨走集

■ 著 / 李安东

■ 主编 / 周斌 李安东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走集/李安东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4.12

(文学放谈丛书)

ISBN 7-80702-153-5

I. 墨... II. 李... III. 中文-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文集

IV. 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25884号

责任编辑: 林革华 耿 宏

封面设计: 女娲文化工作室·琦珩

书 名	墨走集 Mozou Ji
主 编	周 斌 李安东
作 者	李安东 著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 编	130021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80千
版 次	2004年12月第1版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吉林省吉新月历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 数	1-1 000
书 号	ISBN 7-80702-153-5/I·36
定 价	16.00 元

墨走集 目录

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若干问题讨论 / 1

走向学术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回顾 / 20

希望与危机并存

——大陆境外汉语文学的未来 / 28

冬天里的对话

——陈思和教授访谈录 / 34

创世纪

——香港文学的2001 / 48

二元的世界,天平之两端

——评陶然的中篇小说 / 58

寓言与情殇

——评颜纯钩的近期小说 / 68

明月无声 清辉有泪

——读秦岭雪诗集《明月无声》 / 75

一肩担尽古今愁

——小思散文浅论 / 90

此岸看彼岸

——台港杂文的基本风貌 / 93

山与谷

——郭枫作品艺术论 / 106

目 录

墨走集

才气、勇气和流气

——评李敖 / 121

理想与现实的对峙

——评梦莉散文 / 124

存在的迷失

——论20世纪末留学生文学 / 129

在苦难与凡俗中淬砺出的圣洁

——新文学散文品质之一 / 140

冲淡闲适 独抒性灵

——新文学散文品质之二 / 154

躁动的灵魂寻找新的精神家园

——新文学散文品质之三 / 175

走出废墟

——新时期散文流变论 / 211

热闹背后的门道

——关于散文热的思考 / 223

燃烧着的市井欲望

——阮海彪论 / 227

另一种写作资源 / 239

应当重评太平军 / 242

先生之风 高山流水 / 244

后记 / 250

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若干问题讨论

2002年10月底,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了第12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从会议提交的论文^[1]和会议讨论来看,学者们普遍关心的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命名、华文文学史的编撰、史科学、方法论、新移民文学等问题。之所以关心这些问题,是因为它们牵涉到这门学科研究的合法性、合理性、可持续性。这些问题,有些是学科中的老生常谈,但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有些是新出现的问题,有待深入讨论。我们不期望通过几次讨论会、几篇文章就把这些问题一揽子解决,因为这是需要学科环境的改善、学科自身的发展逐步解决的。但是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需要我们从不同的路向去探讨,并透过探讨,逼近这些问题的本相。

—

“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名称是1993年在江西庐山召开的第6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它企图用语种来规范、整合世界上所有用华文创作的文学,就像英语文学、法语文学一样。那么,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概念?是否中国人好大、好全的心理在作祟呢?这个概念有无科学性、有效性呢?在回答这些疑问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它的背景。

“世界华文文学”最早的前身是“台港文学”。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陆一部分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启迪下,发现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并不完整,因为台湾文学和香港文学是长期的缺席者,无论从中华民族的角度还是从文学的角度,这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严重缺失。在资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这些学者以巨大的政治热情和对新的学术生长点发现的喜悦投入到了对台港文学的研究中。1982年在广州暨南大学召开了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预示着其学术交流步入正常化程序,也表明台港文学作为一种另样的文学形态和模式被纳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今天来看,当时在强大

的国家意识感召下的台港文学研究的确是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文学研究领域。1986年在深圳召开的第3届研讨会时,更名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是因为当时有海外华人作家、学者的参与,更重要的是说明这一学科在空间上的拓展,以及因此而面临的新课题。空间的展开一方面使华文文学的内容变得丰富起来,容纳了更多的华文文学形态,另一方面也凸现了这一学科的名称问题,于是,语种文学的概念开始萌芽。“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尽管迄今为止仍然是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合适名称,但怎么看它都不像一个学科分类。首先有个国家意识问题,在1997之前,把港澳与海外并列,似乎还勉强,1997、1999年后,就有点抵牾了,大陆和港澳,虽然两制,但毕竟一国。其次,它过于突出地缘政治概念,忽视了文学内在的传承性,束缚了有意将大陆文学与这些地区文学做比较研究、整合研究的可能性。对这个问题比较敏感的是汕头大学的同行们,1985年他们创办了一份杂志,直接取名《华文文学》,并请秦牧写了发刊词,为“华文文学”释义^②。在释义中,秦牧先生很明确地把华文文学与英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同列,涵盖中国及中国以外的所有华文创作,作为语种的华文文学被初步提出。

“世界华文文学”名称的真正确立是1993年在江西庐山召开的第6次研讨会,在这届会议上还成立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委会”。表面看来这一命名有点好大喜全的样子,与它正在从事的研究对象不对称(不研究大陆文学),但也的确透露了一种信息,即今后应该把中国大陆文学包括在内的华文文学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加以考察。这将是一种多边对话的关系:大陆文学与台港澳文学的对话、中国华文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对话、海外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华文文学对话、华文文学与其他语种文学的对话。特别是把华文文学作为一种语种文学来研究,就超越了国别、民族、文化等多重属性,使我们有可能观察诞生于中国本土的华文文学传统在不同国家、地域、地区的传承和演变。这不仅给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多

元审视的角度(一种始源文学传统有多种演变的可能性),而且也从根本上确立、丰富、发展了华文文学的世界地位和历史文化内涵。所以,“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标志着这一学科趋向成型。

语言是人类重要的文化现象,语言本身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承载着人类的多重信息。从语种的角度研究华文文学,使我们有可能以世界性的眼光,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等进行比较研究,并与这些文学共构世界多元的文学体系。然而对文学的研究,仅仅从语种的角度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从其他的视角来考察,譬如说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就产生了“世界华人文学”这个命名。虽然是一字之变,但它研究的对象却发生了重要转变。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转变?这是和世界华人在各地移民、繁衍的特殊性有关。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王赓武教授对中国的移民形态有过分析,他认为按照时间顺序,中国移民的形态依次为:华商、华工、华侨、华裔^[1]。从华商到华侨,他们大多保留着原属国的国籍,其中有一部分人从实际考量,加入了居住国的国籍,成为华人。他们创作的文学基本上都在华文文学的范畴。问题是在第四种形态,即华裔,他们都是当地出生的第二、三、四代华人,基本上不会说汉语,或会说不会写,加载在他们身上的文化形态是杂交式的,即中华文化与居住国文化的混血。他们使用的书写工具都是当地语言,而非华文的。然而对他们创作的文学进行分析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同样是可以看做中国文学传统在不同语境、语言中所发生的演变,这种演变也许比同一语种之内的演变更有意思,它所透露的多元文化对话的信息是值得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深切关注的,因为它为中华文化遗产、传播、裂变提供了多向途的可能性。其次,是一些新移民用居住国语言创作的文学,是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与用华文创作、面向华人读者的新移民文学不同,这些作品是面向非华人的,是诉说给当地主流社会听的,因此他们的叙事策略、构思兴趣与华文创作大相径庭,透露出些许意识形态的玄机

和诉求，以及西方话语的姿态。把这些作品与同步的华文作品做比较分析，是非常有价值的，使我们可以从创作学的角度讨论当代华文文学的多种可能性、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讨论不同语言读者族群对当代华文文学的期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讨论多语种的当代华文文学。再次，日据时代台湾文学中的日语文学，这是一种被殖民者用殖民者的语言书写被殖民者民族生活的文学（这在殖民地区和国家是常见的文学现象）。面对这样一种母语与书写语言分离的文学现象，我们显然无法把它们归纳到“华文文学”的范畴。可是在台湾文学史上，这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状态，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在对它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台湾作家们用殖民者语言表达台湾生活时，保留了哪些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又丢失了哪些，以及它们对后来台湾文学产生的影响。对一些重要作家，如杨逵，不研究他的日语创作，他的文学成绩就无从说起。

由此可见，“世界华人文学”比“世界华文文学”的外延要大，惟一切割掉的是外国人创作的华文作品，如当代日本汉诗等，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它们对研究华文文学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除了满足一下中国人的汉语、汉文化骄傲感。这里，我们第一次用了“汉语”这个词。从语种学的角度，“世界华文文学”的更确切命名应该是“世界汉语文学”。“华文”这个词由“华人”而来，着眼于民族、文化，并囊括了中华民族的多种语言，它所代表的不是某个单一品种的语言，严格说来，它不能像英语文学、法语文学那样从语种入手的，只有“汉语文学”是与之相称的。但是从历史、文化、民族考量，在海外，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华人都喜欢用“华文”或“华语”来称呼汉语，这是因为在他们心中始终把自己看做是中华民族的人，始终认同、珍爱着中华文化。想想看，世界各地华人聚集的地方都取名为“唐人街”，一个“唐”字，透露出华人内心多么悠长的历史文化情结，而“汉语”是单一的语言，它似乎不能完全表达海外华人对中华民族的感情。从学科定义的有效性、科学性、广延性上讲，我认为“华人文学”、“汉语文学”比“华

文文学”更好。但是从约定俗成的角度,“华文文学”是可被接受的。特别是当下,学科命名的更改,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要牵涉到许多学人力所不及的事,以权宜计,“华文文学”作为学科的命名应该保留。

二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是在荒滩上起步的,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它基本是在拓荒。这个“荒”字,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它研究资源的状态。中国其他文学领域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大量已获得的资源上,古代文学不用说,即使是当代文学,也一直在给研究者们不断提供新的资源。一般说来,先有某种充分的文学生态,再产生对这一生态的研究,是常规。可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突破了这个常规。不是说没有这个生态,而是说研究者们对这个生态区基本上是在所知甚少的情況下进入的,颇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味道,这是犯兵家大忌的。生活中人们常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研究也是一样,手中无粮(资料),心中自然就缺少底气。这样一种研究状态,就会使人对你的研究产生诸多疑问:你的研究有多少科学性?你为什么这么匆忙地研究它?你的资料积累能否支撑起理论的建立?华文文学有多少经典能够构架一部文学史的叙述?

这其实也一直是悬挂在华文文学研究者头上的一把剑,研究者们个个心知肚明,20多年来为这个问题没少费口舌、少掉头发。然而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华文文学研究者们的第一大心病。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们也许会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难以设想华文文学的研究者经常是在做无米之炊。可是反过来,华文文学的研究者也有权问一句:为什么不会这样呢?是的,资源管道的堵塞,责任不在他们,不是他们不想拥有,而是无法拥有。

众所周知,1980年代之前,中国大陆与境外处于长期隔绝之中,两岸

四地、中国和海外基本上没有文学管道，自然也就谈不上资料的积累。改革开放后，虽然经济互动较快，可是双方的敌意并未消除，特别是文学属意识形态领域，非常敏感，管道依旧不能畅通。这是其一。其二，尽管有了一些管道，但大陆由于经济和其他原因，图书馆无财力购买境外的文学图书，使得我们今天要在图书馆觅得一本境外的文学读本，可能比自费去新马泰的旅游还要困难。研究者的资料从何而来？基本靠送。这造成一个极为诡异的现象：个人的资料收藏大于图书馆！这大概是其他学科领域不可想象的。一定没有一个古代文学研究者或现代文学研究者敢说他的个人收藏超过了国家图书馆或现代文学馆，可华文文学研究领域就有人敢拍着胸脯这样说。

别人送资料，目的当然是希望研究他（她），而且是说好话的研究，没有人会千里迢迢送资料来找挨骂的。接受资料的人，首先把这种友情赠送看做是解困济贫的善举，为了保持补给不断，自然也就好话说尽。所以早期的华文文学研究是很遭人诟病的，它其实就像一个刚刚学说话的孩子，能说就不错了，要他有多深刻的批判力，是勉为其难的。审父意识是要到10几岁才有的，这是生命的自然规律。有意思的是，华文文学研究也蛮符合这个生命的自然规律。客观来讲，恰恰是早期的这个幼稚过程，为我们启开了华文文学的大门，使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了境外的作家和作品，能够窥视到境外的一些文学现象，尽管这是一个极不完整的平台。我们应该以一种宽容、谅解的心态对待早期这些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捧场的文章，在当时双方都高度戒备、充满敌意的氛围中，没有客套，哪来后来的文学交流？没有这些相敬如宾，世界华文文学也就不可能成为一门学科，这是一个双赢的游戏。

不仅如此，大陆的华文文学研究还促进了台港澳和海外当地的华文文学研究，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譬如香港文学的研究，起步是在大陆。以前大陆学界一直不大瞧得起香港文学，认为这是一块文学沙漠之

地,港人虽然心中不服,却也底气不足,默认了。是大陆的华文文学学界首先为“文学沙漠”这四个字打抱不平,通过介绍、讨论会、论文等形式逐渐纠正了大陆学人的一些偏见。也许是矫枉过正的原因吧,大陆一些太过肉麻的溢美、一些存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一些资料的严重缺失,反过来又引起了部分香港学人的不满,决定依靠天时地利,自己来研究香港文学。这本是两地文学互动的经典例子,但遗憾的是,两地的部分学人似乎有些意气之争,至今不能联手共同研究。其实两地各有长短,完全可通过优势互补,达成对香港文学的全面研究。香港学人的优势在于资料收集之便利、详尽,以及对香港文学的亲身体验;大陆学人的优势在于有内地现当代文学的背景,以及与香港文学保持一定的审视距离,可以更客观地考察香港文学。我们期待着这一天。

虽然资源严重缺失,但并未阻止大陆学人对编撰各类华文文学史的兴趣,目前我见到的就有各类《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海外华文文学史》等十几种^①,而目前市面上流通的远不止这些。对上述这些文学史,我们不做一一评价,我们也充分肯定它们对华文文学学科建设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我们惟一的疑问是这些宏大的文学史叙述是否建立在充分的史料基础上?是否都具备了每个修史者独到的眼光和胆识?一部文学史,一要具备比较完整的史料,二要具备史家之眼光,三要具备史家之胆识。完整的史料说明你的资源是充分的,少有缺失(或尽可能的少有),如此才能支撑历史叙述的可靠性;史家之眼光要求你能从纷乱的文学现象中寻找出历史的真相;史家之胆识要求你不讳不瞒不溢美,说出真理。我们不要求每一部文学史都是历史的权威解释,但我们要求是尽可能的符合历史。我比较赞赏刘登翰先生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这不只是因为它是两地学者合作的成果,更主要的是它用了带有描述性质的“概观”这个词,我觉得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当我们对一种文学现象的了解尚未达到充分条件的时候,也许不应该匆忙地进入文学史的构架。

文学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为后来人寻找并确立经典作家与作品，同时文学史又是靠这些经典作家和作品来帮助它叙述历史。在20多年的华文文学研究中，学者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我们搜寻出了不少经典作家和作品，并得到公认，譬如说白先勇、於梨华、陈映真、余光中、刘以鬯、西西等等。然而要逼近历史的真相，还有不少工作要做，需要依靠学者的发掘、考证、编选。这方面，香港中文大学的卢玮銮教授和她的同事做了许多努力，她和郑树森、黄继持教授主编的“香港文化研究丛书”^[9]，为我们整理出了香港1940年代到1960年代的许多作品，当然这决不是一锤定音的选本，但却是重要的文学积累。她还带领研究生在中文大学图书馆建立香港文学网络资料库，惟一遗憾的是这个资料库还未对外开放，我们无法通过互联网去查找。此外，香港的陶然、梅子先生也编选了许多香港文学的重要选本^[10]，这些重要的文学积累将会极大地帮助我们逼近香港文学的真相。我们不期望某个选家的选本是权威的，我们反倒希望有不同的选家，不同的选本，然后透过这些选本的集体积淀，终究会筛选出大家公认的经典。这将是一个长期的积淀工作，需要学者们的共同努力。陈思和教授从2001年起主持《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11]，每年一套，其中包括了台港澳地区，就是在做这样的积累工作。

那么华文文学史的编撰究竟有无必要？又有何价值？我认为尽管有一些文学史值得商榷，但大体说来，它们毕竟做了拓荒的工作，给初入门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导读（虽然会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导）。第一步总是非常艰难的，是需要勇气的，无论多么不成熟，至少也给后来者提供了一个上升的平台。白少帆、刘登翰等人的台湾文学史早在十几年前就已出现，而那个时候的大陆学界对台湾文学可以说所知甚少，所以他们的工作决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今天能够对其中的某些著作进行批评，也正是借了他们的著作入门的，所以这些著作自有其历史的价值。特别是10年后的今天，在大陆还未有一部台湾文学史能够超越刘登翰等当年编撰的，这虽有客

观原因,却也说明了他们工作的价值。

问题是目前有不少华文文学史的编撰是属于空手套白狼式的,既无史料的收集,又无研究的积累,凭借大陆出版的极为有限的台港文学作品,再大量借用他人的研究成果,拼凑而成所谓的文学史。这种恶劣的学术风气当然不只是存在于华文文学研究中,但在这个领域表现的比较突出。因为在古代文学或现当代文学领域,抄袭别人,很容易被发现,但在华文文学领域却不易被发现,原因是大陆学界目前对这个领域还不是很了解。我曾有幸见过一部台港文学史,它来自西部某个边远省份。无须看内容,只要看地区和作者名字,就可对这部所谓的学术著作怀疑。这不是武断,而是这个学科的特殊性决定的。我们只需简单地询问其资料来源,就可否定它的存在。此外,由于资讯、交流的不畅通,出现了不该有的张冠李戴、以讹传讹的常识性错误,把男作家误认为是女作家,把香港作家当作是台湾作家等等^⑩。

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有效的华文文学资料库,让资料公开、共享,是促进华文文学研究更上一层楼的最佳途径。因为对大陆学者来说,面对资讯不足、管道不畅、经费有限,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借助互联网,以达到资源共享。1999年在泉州华侨大学召开的第10届世界华文文学会议,笔者就提出应该在大陆建立华文文学网络资料库,得到了当时学会筹委会领导的首肯。2001年在福建武夷山召开的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上,汕头大学《华文文学》主编吴奕锜先生表示要在汕大建立华文文学网站。2002年5月,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成立,饶芃子会长提出分别在广州、汕头、福建成立香港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海峡对岸,世新大学已经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资料中心,2001年,世新大学中文系主任王琮玲博士来复旦大学介绍了他们资料中心的情况。佛光大学中文系在陈信元教授的主持下,也在积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些资源平台的搭建,将会大大提升华文文学研究的学术性,形成健康的学术研究氛围,推动优秀学术著

作的出现。

三

史料构成了华文文学史编撰的第一大障碍，诗学构成了华文文学研究的第二大障碍，用什么样的理论来建构华文文学史一直是研究者们探讨的问题。我曾阅读过两本《20世纪中国文学史》^[9]，他们都有意识地把台港澳地区的文学纳入到中国文学的框架内，比起以往遗漏了这些地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来说，说明他们国家意识的确加强了，但是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因为简单的国家理念无法替代复杂的文学研究，当不能把完整的国家意识与丰富的文学现象有机的结合起来，就会出现似是而非的游离。我们发现，这两本文学史中的台港澳部分都另立一章，基本上和大陆文学不发生关系，特别是1949年之后的文学。我们不可否认两岸四地的政治形态、意识形态存在着严重的差别，但在文化、文学形态上是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做整合、比较的研究和分析，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真正体现出统一的国家意识。否则，同床异梦，貌似结合，神却游离，对文学史的叙述，并无多大价值。按此章法，我们同样可以要求另立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广州文学等章节，因为虽然它们的政治形态、意识形态是一致的，但它们的文学形态却是有差别的哩。我无意苛求这两本已经做出学术努力的著作，对它们来说，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力所不逮。这个新问题，就是方法论，即通过怎样的方法把两岸四地的文学整合在一起？

在华文文学史的编撰中，我们发现多数文学史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一个模式，即以时间和体裁为纵横交叉，以思潮和作家为集中透视，辅之于作品。介绍思潮，又大致按自然史的规律，从发生到消失；介绍作家，按生平简历，取舍繁简；讲解作品，ABCD，蜻蜓点水。这当然不失为一种文学史的方法，它追求的是宏大的叙事结构，希望能够建构一地区、一国或多

国的华文文学的总貌。问题是时代背景、思潮起伏、作家生平不是见智见仁的事,是相对客观的,留给史家的独特发现和描述是有限的。因此,当大家都追求这种宏大叙事的时候,想要不雷同,都是困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鲜有让人耳目一新、深受启发的华文文学史的原因所在。即使一些专题史的研究,譬如小说史、散文史、诗歌史的研究,仍然摆脱不了这样的规范。我们很少探讨世界华文文学自身的内在系统,忽略了文学自足的美学传承和演变。其实一部文学史应该是由文本串联起来的,通过对文本深刻而详尽的解读,就会诞生文学史家独特的发现。哈姆雷特只有一个,但却有一千个不同的读者眼中的哈姆雷特;同样,华文文学的文本也许就那么些,但每个研究者如果都能潜心研读具体的文本,有自己的独特感受和发现(包括隐藏在文本中的历史、政治、文化、经济、种族、身份等信息),由这样的文本串起的文学史一定会让人赏心悦目,多多益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至今还令人爱不释手,是很可以给我们文学史家以启示的,虽然它是一部文学批评的著作。我们一定要走出这样的迷思:惟有宏大的,才是权威的;我是宏大的,所以我就是权威。

在华文文学的研究中,碰到的第三个障碍就是如何处理中国文学(含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中国中心论”和“多元中心论”。这个问题最早是由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王润华先生提出的,他在1991年广东中山召开的第5届会议上发表了《从中国文学传统到海外本土文学传统——论世界华文文学的形成》^[10],提出了世界华文文学的多元中心说,他认为不能把海外华文文学看做是边缘文学或中国文学的支流,甚至认为现在每年优秀的华文小说、诗歌是出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作家的笔下,而不是在中国(含台湾)。他的观点自是引起了持中国中心说的部分中国学者和作家的反对。这场争论表面上似乎被后来的“世界华文文学”这个命名所平息,但苦于一直没有找到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诗学理论,所以矛盾只是暂时被掩盖了。2002年初,汕头大学的吴奕锜等4位中青

年学者发表了《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11],结果引起轩然大波。我认为这场争论仍然是1991年争论的后续,当然问题被尖锐化了。《存在》提出的一些问题,譬如说关于语种问题,关于民族主义问题,这些都是有待探讨、商榷的。有学理的争论,有观点的交锋,有方法论的切磋,才能把是非研究透彻,这对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有益无害。如果抛弃学理,最终受害的还是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学科。如何解决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大陆文学与台港澳文学的关系,如何处理海外华人作家民族身份、政治身份、文化身份、国家身份之间的复杂关联,如何探究华文文学系统内部的传播、衍生、演变的错综构造,这都需要我们借助于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来加以解决。杨匡汉主编的《扬子江与阿里山的对话》^[12]是较早的尝试对两岸文学做比较研究的,它力图重构一个新的秩序,来研究两岸文学,这在当时是一个有学理深度的诗学突破。饶芃子教授多次提出用比较研究、文化研究、身份研究等方法从总体上认识、把握华文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13],这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也有待于研究者在工作中去摸索、实践、完善这些理论,使它们能够真正符合华文文学的诗学期待。

在文学研究领域,很少有学科像华文文学这样有那么多的新生长点,这是因为它首先是一门新兴学科,其次它的空间广阔,再次它是个进行时态。20多年来,从台港文学研究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再到华人文学研究,华文文学的研究场域不断发生转换,空间一再扩大。其实这不仅是简单的空间拓展,背后蕴涵着对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譬如说研究台湾文学,必然会牵涉到旅美的台湾作家,这就牵连出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而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中又会勾连到一些华人的非汉语创作,这就产生了华人文学的研究。新生长点多,研究兴趣的转移也就快,其优势是能够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其劣势是对原来的问题往往研究不深,浅尝辄止。大陆的华文文学研究乐于宏大叙事的建构,对个案、专题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这就造成了宏大叙事的空洞化。这是我们研究方法上的一个